

# 人类学农牧关系的研究范式及其价值

罗 意

**[摘要]**人类学农牧关系的研究范式经历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生产模式向社会政治结构、再向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的转变。范式转变反映了不同时期牧业社会的特征和牧业社会研究的理论取向。范式间有明显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与知识谱系。农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关系,范式转变也反映了族群关系及其理论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伊朗与巴基斯坦交界区域农牧关系研究情况与发展变化的梳理和评述,探讨农牧关系的研究范式及其对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价值,阐明多族群共生关系的维系机制,并揭示此类机制对巩固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的价值。

**[关键词]**农牧关系;研究范式;范式转变;多族群共生机制;族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2)11—0016—06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巩固和发展新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09&ZD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社区参与和社区发展研究”(10YJC850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罗意(1981—),男,重庆长寿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新疆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发展、生态人类学。福建 厦门 361005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农牧关系成为人类学牧业社会与族群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范式经历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生产模式向社会政治结构、再向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的转变。范式的转变反映了不同时期牧业社会的特征与牧业社会研究的理论取向。范式间有明显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并有相互结合的趋势,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与知识谱系。在农牧关系的研究中,来自伊朗与巴基斯坦交界区域的成果最丰富,对理论发展的贡献最大,推动了范式转变。农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关系,范式转变也反映了族群关系及其理论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伊巴交界区域农牧关系研究情况与发展变化的梳理和评述,探讨农牧关系的研究范式及其对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价值,阐明多族群共生关系的维系机制,揭示此类机制对巩固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的意义。

## 一、生态环境与经济生产模式的研究范式

自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著作《努尔人》问世以来,生态环境对游牧社会空间分布与社会组织的影响就广为接受。<sup>[1]</sup>人类学家强调“游牧是一种环境资源、动物与人相互依存关系、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牧民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四方面紧密结合

的人类生态。”<sup>[2] [P.7]</sup>“外在世界”通常指的就是农业社区。生态环境与游牧业,以及游牧业与农业的关系就是牧业社会研究的题中之义。

20 世纪 50 年代,生态环境与经济生产模式的视角率先由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引入这一区域农牧关系的研究中。巴特将“生态环境”的外延由自然生态环境扩展到了相邻的族群及其活动。<sup>[3] [P.1079]</sup>借用“生态位”的概念,他对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三个族群在“环境”中的生态位、经济生产模式及彼此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三个族群分别是从事定居农业的巴坦人(Pathans),从事农业与转场放牧的科希斯坦人(Kohistanis)和从事游牧业的古吉拉人(Gujars)。

巴坦人的社区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姓社区,土地所有者构成了社区中地位较高的种姓,其他种姓和职业群体是土地所有者的政治追随者或农奴。历史上,巴坦人用武力将科希斯坦人驱逐到了北部山区,占据了斯瓦特峡谷和印度河南部支流两岸的肥沃平原。他们的生计是发达的犁耕农业,种植小麦、玉米和稻米。仅有部分巴坦人从事农业,各种职业群体为其提供特定的服务,而这这就要求农民生产大量的剩余产品,因此,他们选择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然而,北部山区的高海拔

和最低气温阻碍了巴坦人进一步扩张。因为一旦超出了两熟作物制的范围,这种经济和社会系统就不可能生存下来。<sup>[3] (P. 1081)</sup>

科希斯坦人被赶到北部山区后开始修造狭长的小块梯田,依靠融雪灌溉。由于山区夏季短,只能选择一年一熟的耕作制度,种植玉米和粟米,他们也从事转场放牧,每年有4-8个月在夏牧场。农业与转场放牧的结合使科希斯坦人在巴坦人不感兴趣的山区生存下来。由于巴坦人无力跨越两熟制与一熟制的自然边界,两个族群的文化边界就与自然边界重合,它们的分布呈现出相对静态的图景。<sup>[3] (P. 1082)</sup> 巴坦人和科希斯坦人各自利用不同资源,互不冲突,形成一种非竞争性的共生关系。

古吉拉人在巴坦人和科希斯坦人控制的区域都有分布,从事转场放牧和游牧两种经济生产模式。在巴坦人控制的地区,古吉拉人被巴坦社区吸纳,成为职业牧民。他们在政治上是巴坦人的依附者或农奴,负责放牧畜群,为村落提供奶制品、肉类和劳动力。夏季,他们以黄油和牲畜作为租金,利用巴坦人控制但未充分利用的山区。在农忙高峰期,古吉拉人通常也被作为农业劳动力使用,换取冬季在田地中放牧的权力。古吉拉人与巴坦人形成了可持续的共生关系,两个族群在产品、劳动力和信息等方面频繁地交换巩固了这种共生关系。

古吉拉人也分布于科希斯坦人控制区域的西部。两个族群都从事牧业,利用相同资源,看起来冲突不可避免?但实际上,两个群体很少出现军事冲突,也没有迹象表明一个群体的发展以牺牲另一个群体为代价。<sup>[3] (P. 1086)</sup> 科希斯坦人的农业和畜牧业相当均衡。玉米、粟米的秸秆是畜群主要的冬草,一年一熟的耕作制度限制了畜群规模,以至于不能完全利用夏牧场,为古吉拉人留出了夏季利用这些草场的空间。两个族群不存在激烈的冲突,反倒建立起了稳定的、非竞争性的共生关系。

总的来说,巴特采用了一种精心修正的生态学方法。族群占据的生态位、经济生产模式与自然生态条件共同构成了族群生存的小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中,如果族群利用不同资源,或是处于弱势的族群可以利用更边缘的资源,族群就可共生。<sup>[3] (P. 1088)</sup> 族群间频繁的产品、劳动力和信息交换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使之具

有稳定性和持续性。通过斯瓦特地区三个族群关系的研究,巴特构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生产模式的研究范式。在对波斯南部游牧民——巴瑟里部族(Basseri)<sup>[4]</sup>,以及巴坦人与周边族群关系<sup>[5] (P. 125-126)</sup>的研究中,巴特延续了这一范式。

##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认识到巴特的范式过于强调地方生态系统的边界与各种经济生产模式在农牧关系中的作用,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人类学家强调应对社会文化因素,及其与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模式之关系做深入分析,倡导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和“动态分析”方法。<sup>[6] (P. 198)</sup> 布雷恩·斯普纳(Brain Spooner)、菲利普·C. 萨尔兹曼(Philip Carl Salzman)从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对伊朗南部俾路支游牧民(Baluchi)与萨哈瑞农民(Shahri)关系的两种形式做了深入研究。他们都视不可避免的冲突为农牧关系的主体。<sup>[7]</sup> 因此,农牧民共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存在协调两者关系的机制,以及这种机制的有效性。两位人类学家都把焦点集中到头人(hakom)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上,认为头人的位置具有结构与功能意义——是游牧民与农民的结合点,是农牧关系的调节人。

以职业和生活方式作为标准,这一地区包括游牧民和农民两大族群。但是,若以社会身份而论则包括头人家族(Hakomzāt)、游牧部落的首领(Sardar)、游牧民、农民和农奴(Gholām)。头人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力,其家族控制着农业中心。在斯普纳研究的个案中,头人来自游牧部落,是部落首领,控制着游牧民。农民交纳的实物税是头人财富的主要来源。游牧民提供的武力支持,是头人维系统治的工具。<sup>[8] (P. 142)</sup> 头人给予农民保护,使之免于游牧民的武力抢掠。同时,他又允许游牧民占有农区的部分耕地和水资源,使之分享农产品。游牧民与农民都通过头人获得保护或利益。头人则处于超然的位置,是游牧民与农民的中间人,调节两者的矛盾和冲突。

但是,头人与游牧民的关系存在诸多变数。在攫取了农业中心的权力后,头人家族的财富和权力都将得到增长,逐渐演变为“王室”。社会被分为王室、游牧民和农民三个等级。当王室的地位稳固后,农业成为王室家族的财富之源,他们更愿意保护土地、庄稼和农民。在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王室与农民结成了稳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但部落并没有变得更为强大或更为富裕,社会地位没有变化,游牧民与王室、农民的关系非但没有加强,反而被进一步弱化,这就导致游牧民与他们的关系变得相当不稳定。在此情况下,王室感到了游牧部落的威胁,于是建造要塞保卫农业中心。这一过程继续发展,王室与游牧民的结构距离进一步拉大,两者认同的基础进一步被动摇,就会引发游牧民对农业中心新一轮的入侵。<sup>[8] (P. 148-149)</sup>

萨尔兹曼在 1978 年对俾路支东南部绿洲农牧民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并非所有头人都来自游牧部落,部分头人来自于武士或强盗群体。<sup>[9] (P. 125)</sup> 这样看来,斯普纳提供的个案就只是一种特例。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头人如何同时调动农民社区和游牧部落的资源,积累财富并强化权力? 又如何调节农牧关系,维持两个“敌对”族群的平衡? 他在 1983 年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这一过程,认为农民与游牧民的关系在无政府和无正式领导的条件下注定是不稳定的,而且必然会发生对双方都不利的冲突。<sup>[10] (P. 262-283)</sup> 冲突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存在权力的不平衡。牧民是移动的,但在必要时也可以组成强大的群体,农民则被束缚在不能移动的资源上。这些资源需要随时关注,却又很难有效保护; 第二,周期性的干旱,对两个族群都很不利,但结果却不尽相同。牧民直接依靠牧场饲养畜群,干旱对牧民的影响比对依靠灌溉的农民要严重。这意味着在干旱时,牧民比农民更缺食物。持续的干旱会转变成对农民的威胁,因为牧民的武力更强,而且亟须绿洲的农产品,但摧毁绿洲对牧民而言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农产品,而根本不希望自己也成为农民。

因此,两大族群的潜在冲突要求出现一种结合机制,避免直接冲突。为此,萨尔兹曼采纳了斯普纳“中间人”的观点。但很显然,他并不认为中间人的位置是由头人与游牧部落的关系决定的。由于农业与畜牧业生产的专业化,农牧民的族群边界与自然边界的重合,使得双方都需要交换产品、劳动和信息。稳定、持续和频繁的交换对农牧民都有利。因此,头人正好成为了族群的结合点,并利用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维持着农牧民交换系统的稳定,有效地协调着农牧关系。

缺少了中间人,农牧关系就可能走向竞争而非合作。如在萨尔哈迪,由于低海拔地区少有河流,地下水位太深而不能修造坎儿井加以利用,而高海拔地区气温过于寒冷,导致农业难以有效发

展,这使得该地区的游牧民不能依靠与农区的交换获得农产品。在此情况下,游牧部落的首领更愿意生活在部落中,组织武力不时劫掠农区和过往商队获取财富。<sup>[11] (P. 441-443)</sup> 因此,这一地区就缺乏产生头人的政治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中只有部落首领而无头人。而在缺少中间人的情况下,农牧民的矛盾就很难协调,对农产品的需求导致游牧民不断对农民实施抢劫,共生的农牧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与巴特不同,斯普纳和萨尔兹曼将分析的重点引向了社会政治结构,可称之为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范式。如巴菲尔德所说,由于游牧这种生活方式与周围的定居文明非常不同,故而两者的误解也就不可避免。<sup>[12] (P. 26)</sup> 同时,游牧本质上又是一种非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必须以交换或抢劫的形式换取粮食、食盐、铁等生产生活物资。与游牧业不同,农业的自足性相当强,农民无需和牧民交换也能生存。因此,农牧民交换的基础并不牢靠,两者的冲突很难由农牧业生产模式来平衡。在斯普纳看来,消除冲突的力量来自“社会和文化因素”<sup>[6] (P. 206)</sup>,共生的农牧关系只有通过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才有可能。“中间人”就是社会政治制度设计的结果,通过中间人化解两大群体的冲突,维系交换系统和共生关系的稳定。

### 三、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范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学家意识到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功能主义解释,缺乏对历史、权力关系和外在社会政治结构的观照,无力解释农牧关系的变迁。1997 年,埃利奥特·弗拉勤(Elliot Fratkin)指出“牧业社会的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转向政治生态学的趋势日益增强,关注游牧社会组织政治运作和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尤其强调与大型国家的关系问题。”<sup>[13] (P. 236-239)</sup> 这一路径试图跳出族群内部社会政治结构与生产方式的范畴,将农牧关系置于民族国家进程和外在社会政治结构变动等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揭示历史过程、外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体系与族群权力关系的运作过程和农牧关系的演变趋势。

实际上,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一直隐含在巴特、斯普纳、萨尔兹曼等人的研究之中。1969 年,巴特对巴坦西部地区巴坦人与哈扎拉人(Hazara)关系的变化做了分析。传统上,农牧兼营的哈扎拉人与巴坦农牧民存在激烈的竞争。但

在哈扎拉地区被整合进阿富汗斯坦的国家体系后,游牧的巴坦人开始季节性地进入夏季牧场。区域内的流动更加自由,并为商人创造了活动空间。为获得货物贸易资源,越来越多的巴坦人移入这一地区,很多人甚至选择在此定居。<sup>[5] (P. 1250126)</sup> 乌戈·法比特(Ugo Fabietti)认为,斯普纳关于农牧关系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循环论。<sup>[14] (P. 96)</sup> 萨尔兹曼也意识到波斯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对俾路支人的政治结构与首领角色产生了影响。<sup>[11] (P. 439)</sup>

然而,历史过程、外在政治结构的影响、国家与族群权力关系从未占据这些研究的中心位置,往往只是一带而过,或是作为时代与社会背景予以交代。凯瑟琳·A. 加尔文(Kathleen A. Galvin)强调,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已经成为游牧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sup>[15] (P. 186)</sup> 而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又主要是在国家政策与族群权力关系变换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对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批判,都导向了历史过程和权力关系的研究范式。

丹尼尔·G. 贝茨(Daniel G. Bates)认为,巴特建构了一个小生态环境中各族群稳定的共存模式。这种模式由各不相同但又互补的经济生产模式所引起,又被政治和社会过程所强化,从而建构了各个区域的边界。<sup>[16] (P. 112)</sup> 然而,这一模式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所有族群都会对内部和外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压力做出反应,不断调整经济生产模式,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做出不利于共生关系的经济行为;其次,族群的移动不完全是为了利用边缘的草场资源,也可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族群根据强势族群的生产周期做出的调整。<sup>[16] (P. 14-116)</sup> 因此,农牧民的共生并非源于对非竞争性资源的控制,而可能来自于对冲突的控制。只要可能,国家权力就会干预族群资源和空间的分配。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权力有被作为一种资源被地方群体所利用,并作为取得支配权和经济主导权的武器。<sup>[16] (P. 117)</sup>

贝茨以对土耳其东南部约留克(Yörük)游牧民与土库曼(türkemen)、库尔德(Kurds)和阿列维(Alevi)农民、农牧兼营者关系的分析支持其观点。从经济生产模式上看,三类族群的关系与斯瓦特地区三个族群的共生关系如出一辙。但是,这种共生关系并非经济生产模式互动的结果。由于约留克人原来在安纳托利亚的牧场出现压力,他们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迁入这一地区。在此之前,国家为控制部落政治力量,已经强迫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定居,所以出现了大片可供游牧业发展的空间。约留克人之所以被允许进入这片区域,并保留游牧的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不至于威胁到这个国家。牧民移动周期与村落生产周期没有冲突,不是因为牧场的空间分布与游牧业生产周期相符,而是政治调节的结果。<sup>[16] (P. 123-127)</sup> 此外,已经定居的库尔德、土库曼农民将空出的草场出租给约留克人,不仅可以获得黄油、奶制品等畜产品,而且可以收取租金。因此,牧民在与农民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共生的农牧关系是牧民调整生产周期、适应不平衡族群权力关系的结果。

法比特同样强调国家与族群权力、外在社会政治结构对农牧关系的影响,但矛头指向了斯普纳和萨尔兹曼。他赞同“中间人”的分析框架,也认为两位人类学家对头人的结构位置与功能的分析是恰当的。但是,法比特所关心的是那些源自武士或强盗群体的头人如何获得和巩固中间人的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外国势力对俾路支地区的侵略与控制,地方社会对这些势力的操弄,以及该地区被整合进民族国家的过程。

长期以来,俾路支地区不时遭受波斯、卡拉特、英国等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控制,但他们又都无力完全控制这些部落。因此,比较理想的选择是扶持一个有势力的头人为代理人,间接统治这些区域。同时,如斯普纳的研究所揭示的,各个游牧部落周期性地陷入对地区控制权的激烈争夺。争夺中的获胜者为维护其统治,竭力获取外国势力或是官方的承认,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俾路支马克兰地区的杰契克人(Gichkis)原为强盗群体,他们通过武力、外交、诡计和联姻策略成功地控制了农业中心。为维护统治,他们组建了由流散农民、牧民和奴隶组成的雇佣军。但当雇佣军不足以应付其他势力(如前盟友)的攻击时,杰契克人转而寻求游牧部落的支持。游牧部落因此获得了控制部分耕地和水资源的机会。同时,他们还成功地与外国势力建立起联系,使自己成为这些势力的代理人,并借此打压竞争对手、镇压反抗者和防范游牧民的威胁。<sup>[14] (P. 98-99)</sup> 在此情况下,杰契克人的头人获得和巩固了中间人的位置,并维系着农牧关系的稳定。

人类学家注意到,二战后这些地区被整合进

民族国家体系之中,游牧业不断被边缘化。萨尔兹曼发现,在萨尔哈迪的俾路支游牧部落被纳入国家体系后,游牧民被禁止抢劫农业村落,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通过机械化的灌溉工程和各种扶持政策鼓励游牧民转向定居农业。<sup>[17] (P. 428-429)</sup> 游牧民的移动也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营地选择日益受到城镇与农业中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牧民参与到了劳动力市场之中。<sup>[18] (P. 257)</sup> 农业发展与城镇化导致草原“碎片化”,压缩了牧业的生产空间。游牧业面临的困境、城市中的务工机会和鼓励定居的政策使得多数牧民,尤其是年轻的牧民选择脱离牧业。从现有研究来看,牧民似乎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应付这些变化。除此而外,牧民还遭遇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持续的干旱严重威胁到了干旱区、半干旱区牧民的生存。加尔文指出“牧业发展的机会相当之小,大多数牧业社会面临的风险正不断增加。”<sup>[15] (P. 193)</sup>

从时间脉络来看,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并在前两种范式的基础上延伸了时间深度和拓展了研究视野。与第一种范式不同,这种范式认为农牧关系决定经济生产模式,而非经济生产模式决定农牧关系。农牧关系是社会政治结构与族群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其特征由共生或竞争的经济生产模式表现出来。与第二种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强调外在社会政治结构和民族国家进程对农牧关系的影响,并认为要对地方社会适应或利用外部权力的策略,以及这种策略对农牧关系的影响予以分析。此外,这种范式认为农牧关系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总是在应对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变迁,是一种动态的和不断自我调适的关系。

#### 四、研究范式的转变

三种研究范式的关系可概括为批判性的继承与彼此互补两个方面。首先,新范式总是建立在对已有范式批判性的继承之上。斯普纳和萨尔兹曼在巴特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政治结构因素,贝茨和法比特又在他们的基础上引入了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的维度。三种研究范式提供了分析农牧关系中经济、社会、政治、历史与权力关系等各个层面的理论与方法;其次,三种研究范式有很强的互补性,为当代农牧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由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分析框架。近年来,人类学家或是以微观研究回应全球化与国家体系下农牧关系的发展趋势,或是在全球化与国家体系背景下分

析微观层次中的农牧关系。总的来说,三种研究范式结合的趋势日益增强,并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与知识谱系。

范式的转变反映了不同时期牧业社会的特征和人类学牧业社会研究的理论取向。1980年,拉达戴森·哈德森(Rada Dyson-Hudson)在一篇关于牧业社会研究的评论性文章中呼唤一种动态性的研究范式,强调要对影响牧业社会的各种变量进行分析。<sup>[19] (P. 55-56)</sup> 弗拉勤和加尔文分别在1997年和2009年的评述文章中识别出民族国家进程、族群关系、发展政策、市场化、全球化等变量。从本文引用的个案来看,来自伊巴交界区域农牧关系的研究反映了人类学牧业社会研究的发展过程与趋势。同时,理论的发展也反映了民族国家体系、市场体系和全球化浪潮对农牧关系和牧业社会的深刻影响。

此外,农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关系。研究表明,族群间存在着各种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的连接机制。这些机制是族群间竞争、互动与适应的结果,维系和调节着族群关系,保障着各族群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和权力,是一种内生的多族群共生机制,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范式转变则表明,民族国家进程和全球化已经成为影响族群关系重要的外部力量。但是这些力量要充分发挥作用,都必然借用各种内生机制。连接内生机制与外部力量的是族群的实践。一方面,族群在实践中构建各种内生机制,并以内生机制维系族群间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族群通过各种策略利用来自国家和全球化的力量,通过实践将这些力量与内生机制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共生的族群关系。

#### 五、研究范式的价值

人类学农牧关系的研究范式对我国农牧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族群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些研究范式为研究我国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农牧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大陆是一个“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sup>[20] (P. 2)</sup> 秦汉以来,长城将这一地理单元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分别与农业、游牧业分布相重合。连接两大区域的是河西走廊与藏彝走廊。两大走廊都是农牧交错地带,多种经济生产模式共生于此。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战争、交往、互动与融合都沿着这

两条走廊展开。同时,我国五大牧区中还广泛分布着农牧共生的区域。伊巴交界区域也是农牧交错的走廊和农牧共生的区域。这些区域农牧关系的形成、演变、形式与特征都与我国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和农牧共生区域的情况类似。因此这一区域农牧关系的研究就为我国各条走廊的人类学研究,以及农牧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

其次,这些研究范式有助于增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和理解。人类学农牧关系的研究揭示出族群间存在着内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共生机制。研究我国各民族之间广泛存在的此类共生机制有助于阐明各民族共生互补的历史与现实,丰富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认识。实际上,这些机制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了中华民族。

最后,这些研究范式揭示了多族群共生的机制在化解族群矛盾和冲突中的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多族群国家的族群矛盾、族群冲突日益突出。如何化解族群矛盾、族群冲突,构建和谐族群关系是各国政府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族群间内生的共生机制仍然是调节族群关系最有力的工具,并且能够与国家政策有效地结合起来,共同构建、巩固和发展和谐的族群关系。这就需要发掘这些机制的价值,探索这些机制与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制度结合的路径。简言之,就是要将自上而下的民族政策与自下而上的、内生的多族群共生机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种机制的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 参考文献:

- [1][英]埃文斯-普里查德. 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 褚建芳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2]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3] Fredrik Barth.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 North Pakist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58, No. 6, 1956.
- [4] Fredrik Barth. Nomads of South Persia: The Basseri of the Khamseh Confederacy. Oslo: Oslo University Press, 1961.
- [5] Fredrik Barth, 1969. 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 *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ed. Fredrik Barth.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98.
- [6] Brain Spooner. Towards a Generative Model of Nomadism,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4, No. 3, 1971, p. 198.
- [7] Ninda Swilder.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Brahui Sedentarization, *Ethnology*, Vol. 12, No. 3, 1973, p. 299.
- [8] Brain Spooner. Politics, Kinship, and Ecology in Southeast Persia, *Ethnology*, Vol. 8, No. 8, 1969, p. 142.
- [9] Philip C. Salzman, 1978. The Proto - State in Iranian Baluchistan. *The Origins of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ed. R. Cohen and E. R. Service, Philadelphia.
- [10] Philip C. Salzman, 1983. Why Tribes Have Chiefs: A Case from Baluchistan. *The Conflict of Tribe and State in Iran and Afghanistan*, ed. R. Rapper, London.
- [11] Philip C. Salzman. Adaption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Iranian Baluchistan, *Ethnology*, Vol. 10, No. 4, 1971.
- [12][美]巴菲尔德. 危险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M]. 袁剑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13] Elliot Fradkin. Pastoralism: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6, 1997.
- [14] Ugo Fabietti. Power Relations in Southern Baluchistan: A Comparison of Three Ethnographic Cases, *Ethnology*, Vol. 31, No. 1, 1992.
- [15] Kathleen A Galvin. Transitions: Pastoralists Living with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8, 2009.
- [16] Daniel G. Bate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Peasant - Nomad Mutualism,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44, No. 3, 1971.
- [17] Philip Car Salzma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aluchi Tribe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 No. 4, 1973.
- [18] Philip Car Salzman. Pastoralism Nomad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Based on Research in Ir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Vol. 58, No. 2, 2002.
- [19] Dyson - Hudson and Neville Dyson - Hudson. Nomadic Pastor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9, 1980.
- [20] 费孝通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9.

收稿日期: 2012 - 04 - 18 责任编辑 李克建